

民国时期藏族人士对“中华民族” 概念与话语的认识和运用*

励 轩

民国时期,藏族之中较早对“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有所认识的应是当时身处内地的九世班禅及其追随者,以及一些精通汉藏语文、游走于汉藏两地的康巴藏族。这些藏族人士深受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初步认识了“中华民族”概念,并接受了五族共建中华民族的话语,还通过创办刊物等方式推动了“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在藏族社会的进一步传播。全面抗战的爆发是藏族同胞“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关键,使得他们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接纳与认同超越了地域与派系界限。不过,一些藏族人士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认识与理解并不与主张民族同化的国民党保守派完全一致,他们在相关话语的使用上更注意平衡中华民族的一体与多元。另外,这些藏族人士也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建设的包容性主张更具有吸引力,后者在维护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同时,始终兼顾到了藏族等少数民族的地位和利益,这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获得国内各少数民族人士广泛支持的缘由。

关键词:藏族 格桑泽仁 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 国民党

作者励轩,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地址:成都市,邮编 610044。

“中华民族”概念史研究是近年来的学术热点,目前学界已有不少成果。但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集中于“中华民族”概念在汉族社会形成、发展与传播的情形,对于“中华民族”概念进入少数民族社会以及少数民族人士如何理解这一概念的研究则相对较少。^①当然,这一局面正在改善,如黄兴涛在其专著中曾论述了日本侵华对少数民族人士“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影响,^②笔者利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版本《毛泽东选集》研究了“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藏文和维吾尔文翻译,^③还有学者研究了抗战对西南少数民族中华民族认同构建之影响^④及当时西南地区彝族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近代东部藏区商业贸易中藏族与各民族的交流交往研究”(项目编号:20VMZ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获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专项基金资助。论文撰写过程中,得到中央民族大学喜饶尼玛教授以及多位外审专家的宝贵建议,在此谨致谢意!

① 黄兴涛:《深化中华民族自觉史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研究》2020年第6期。

②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6—194页。

③ 励轩:《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翻译——基于汉文、藏文、维吾尔文版《毛泽东选集》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④ 何一民:《抗战时期国家与中华民族认同之构建及影响——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例》,《四川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与苗族精英中华民族认同的表述与实践。^① 不过,总的来看,对于少数民族人士理解与接纳“中华民族”概念的历史研究仍存在较大的挖掘空间,特别是学界缺乏系统研究某一具体民族“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成果。有鉴于此,本文将主要利用民国时期发行的报刊及个人著述资料,探讨藏族人士对“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的认识和运用,进一步剖析这一群体“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复杂过程。本文认为,在认识和运用“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方面,很多藏族人士早期虽然也受到国民党关于“中华民族”的主流论述影响,但他们中一些人并没有接受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建构一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实践,而是对“中华民族”概念一直抱有一种多元一体的理解,这与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中华民族建设理念形成了共鸣,最终合力推动了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前后民族话语的调整。

一、藏族人士对“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的早期认识和运用

清末民国初年,很多汉族已经对“中华民族”相关概念不太陌生,但对少数民族人士来说,这些概念却仍是陌生的。据笔者考证,藏文中出现“中华民族”一词可能要到1930年,且民国时期“中华民族”的藏文译词实际上并没有统一和规范。^② 由于“中华民族”概念藏文翻译的迟滞且混杂,再加之当时涉藏地区交通不便,学校教育相对落后,报纸发行也不发达,导致现代政治概念与话语的传播较为闭塞,藏族人士往往要到内地才能接触到当时汉族社会流行的一些概念与话语。虽然一些藏传佛教高僧在清末民初一直生活在内地,但他们中绝大多数远离政治生活,基本见不到他们使用“中华民族”概念的记载,而较早对“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有所认识并主动运用这些概念与话语的藏族人士则是由西藏出走来到内地的九世班禅及其追随者。1923年11月,九世班禅因与十三世达赖及后者掌控的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矛盾激化,携亲信随从由西藏出走到内地。作为西藏地方的宗教领袖,九世班禅表现了极大的爱国热诚,深受内地各界人士欢迎,其周围也聚拢了一大批精通汉藏文的藏汉人士,在各地设立了班禅办公处或办事处,作为接待、联络、沟通与宣传之用。1928年前后,随着九世班禅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日趋紧密,其本人及追随者也逐渐接纳了包含“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的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班禅驻川办事处在所办刊物《藏民声泪》上发表的《班禅额尔德尼驻川办事处成立告全国国民》一文即是在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指导下写成,文章控诉,“中华民族是世界被压迫民族之一,各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国家之成立与国家澎涨的必要上,违背民族自决的原则,对我们中华民族缔结了许多‘民族自杀’的不平等条约;沦我们中华民族所组织的国家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并呼吁全国人民,特别是汉藏同胞团结起来,谋求中华民族的自决与独立。^③ 由于该文出自班禅驻川办事处,其关于“中华民族”的论述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九世班禅及其追随者对“中华民族”概念最早的认识。

在《藏民声泪》之后,班禅驻京办公处于1929年6月创立《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月刊》作为机关刊物,以促进藏人认识和了解国民党及三民主义。该刊物在当时成为向藏人传播“中华民

^① 伊利贵:《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精英中华民族认同的表述与实践》,《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② 励轩:《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翻译——基于汉文、藏文、维吾尔文版〈毛泽东选集〉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③ 《班禅额尔德尼驻川办事处成立告全国国民》,《藏民声泪》1928年第1期。

族”概念与话语的一个重要舆论阵地。在创刊号上,《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月刊》即刊载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华民族”的宣传言论:“观此,则知汉满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在事实上是很可能而且很必要。我们必须赶快积极的把汉满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使中华民国只有中华民族一个名词,所谓汉蒙回藏的滋养,都成了历史上的遗迹。”^①不过,这种同化色彩极重的话语之后并没有成为这份刊物的主导,很快被蒙藏委员会主张的五族共建中华民族所取代。在该刊物的第1—2期合集中,刊载了大量蒙藏委员会的宣传性文章,其中涉及“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的,往往以更具包容性的五族共建中华民族这一面貌出现,如在介绍国民党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民族主义包含两种意思:第一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第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一律平等的意义!满清政府推倒,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任何一民族不压迫其他民族,由五族而组成一中华民族,要使国内民族完全自由平等的结合。”^②

相对于强调同化的中华民族话语,五族共建中华民族更能被藏人所接受。九世班禅本人也主动使用这一包容性的“中华民族”话语,^③他在1931年5月出席蒙古旅京同乡暨蒙古文化促进会欢迎会时说:“自辛亥以后,满汉蒙回藏已团结成一个坚强底中华民族。”^④表达了对五族共建一个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认可。追随九世班禅从西藏到内地的一些藏族人士在他前后也陆陆续续表明了对“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的接纳。时任班禅驻京办公处处长、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罗桑坚赞1930年3月在中央广播无线电台报告蒙藏形势时说:“蒙藏同胞要澈底的觉悟,服从中央命令,真确的认识三民主义,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新蒙古新西藏,使蒙藏人民完成自决自治之全功,使蒙藏人民为整个的中华民族之一份子。”^⑤班禅驻京办公处代表、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的罗桑囊嘉在1931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今幸革命成功,南北统一,国府内顾无忧,正可谋整个民族实现,以巩固边陲之领土,其欣幸情形,已可想见……”^⑥罗桑囊嘉虽未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却用“整个民族”来代替,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认可。当然,九世班禅及其追随者使用“中华民族”话语还有一个重要背景不容忽视。当时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之间存着较大矛盾和分歧,后者掌控的西藏地方政府内部势力存在着一些分离倾向,使用国民党倡导的“中华民族”话语某种程度上是九世班禅及其追随者的一种政治表态,表明其与西藏地方政府不同,是支持中央政府和维护祖国统一的。1932年6月,罗桑坚赞在给行政院的一份报告中就将这样的心态展现了出来。罗桑坚赞在报告中猛烈批评达赖及西藏地方政府一方,认为:“达赖喇嘛利令智昏,认贼作父。始则联俄以拒英,继则亲英而叛华,反复无常,变化莫测。勾结外援,遗害地方……”,又代表班禅一方表态:“青康西藏同隶中国政府,青康藏民同为中华民族……”。^⑦相对于班禅一方,当时达赖一方在接纳和使用“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方面确实没有那么积极。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领导本刊之言论——国民革命中之西藏》,《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月刊》1929年创刊号。

② 《何谓中国国民党!》,《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月刊》1929年第1—2期。

③ 九世班禅本人汉语水平有限,其运用“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要借助翻译。

④ 刘家驹编译:《班禅大师全集》,班禅堪布会议厅,1943年,第121页。

⑤ 《蒙藏历年外交之经过》,《申报》1930年3月34日。

⑥ 罗桑囊嘉:《中藏关系之报告》,《军事杂志》1931年第36期。

⑦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班禅驻京办公处为陈述西藏政情历数达赖之罪并请讨伐达赖等情事致行政院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6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31页。

除了九世班禅及其追随者,另外一个积极接纳与使用“中华民族”概念及话语的藏族群体是精通汉藏语文、游走于汉藏两地的康巴藏族,其中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是来自巴塘的格桑泽仁。格桑泽仁1904年生于四川雅州府巴安司(今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从小在巴塘接受汉藏语文训练,稍长后在昆明等地学习,精通汉藏语文,并对政治事务极感兴趣。1928年,格桑泽仁经九世班禅一位管家喇嘛公登扎西帮助,通过班禅,被推荐到南京国民政府新成立的蒙藏委员会任藏语翻译,随后得到国民党大员戴季陶赏识,于当年获任蒙藏委员会七位委员之一,同时兼任蒙藏周报社副社长。不久,格桑泽仁加入国民党,成为藏族的第一位国民党党员。^① 格桑泽仁在南京的最初几年,恰逢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及国民党的“中华民族”话语也被越来越多社会精英所熟悉,热衷于政治事务的格桑泽仁对此自然也不会陌生。1929年,格桑泽仁在一份给南京国民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意见书中,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格桑泽仁指出,解决“西藏问题”迫在眉睫,强调中央应该注重国防、改进蒙藏事宜、实现三民主义,若真做到此,则“进可以谋世界之大同,退亦不失中华民族之光荣”。^② 在意见书中,格桑泽仁也使用“西藏民族”一词,并认为西康和西藏是同一民族,但其立场显然是以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而言。在次年发表的《亚洲民族问题与中国边疆问题》一文中,格桑泽仁对“中华民族”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说:“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所谓‘文物之邦’‘万国来朝’,这样看来,亚洲以至于全世界,讲到‘大’与‘老’的资格,更舍中华民国而谁属?”^③对中华民族拥有古老的文明、广大的地域以及众多的人口表现出一种民族自豪感。在文章中,格桑泽仁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与外国各民族,如日本、印度、安南、朝鲜等是处于同一层次的。从格桑泽仁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说,他是深受孙中山1919年发表的《三民主义》一文所影响的,孙中山在那篇文章中说:“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④

除格桑泽仁自身外,由他邀请至南京工作的巴塘籍同乡刘家驹也是较早使用“中华民族”概念的康巴藏族人士之一。刘家驹1929年到南京后,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工作,并兼任《蒙藏周报》的藏文股主任,可能是在1930年将“中华民族”一词翻译为藏文krung hog mi rigs的人。^⑤ 他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应该也较为熟悉,对“中华民族”相关概念更不会陌生。刘家驹署名文章中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是1931年,当时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央在西康推行党务,应该因地制宜,而目前亟待解决的是组织康藏党义筹备会,从而“加紧宣传俾西南人民,得明了帝国主义之阴谋,力求民族之解放,培养自治之能力,早日完成整个之中华民族之大团结”。^⑥ 在他的认识中,包括藏族在内的西南人民应该都属于中华民族。刘家驹本人长期从事翻译工作,对“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藏译及传播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由于格桑泽仁等康巴藏族的带头作用,有一批康藏青年在20世纪30年代初陆续到南京

^① 冯有志:《西康史拾遗》,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版,第111页;王川:《格桑泽仁传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② 格桑泽仁:《解决西藏问题意见书》,《蒙藏委员会公报》1929年第1—2期。

^③ 格桑泽仁:《亚洲民族问题与中国边疆问题》,《新亚细亚》1930年第1卷第1期。

^④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6页。

^⑤ 经笔者考证,当时刘家驹与同在蒙藏委员会的杨质夫均曾为《蒙藏周报》做过藏文翻译,但相关译文并不署名,故难以下一定论。

^⑥ 刘家驹:《康藏之过去及今后之建设》,《新亚细亚》1931年第2卷第5期。

求学,他们受国民党政治话语的影响,逐渐接纳并使用“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1933年,这批康藏青年在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支持下成立康藏前锋社,创办了《康藏前锋》杂志,并在该杂志出版的文章中大量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及相关话语。在创刊号的《康藏与中国》一文中,这些康藏青年表达了对“中华民族”及其与康藏人民关系的理解:“中华民族因受帝国主义政治力经济力的压迫,而处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形成整个中华民族的危机,吾人欲此危机之平安渡过,首在国内各民族作根本之团结。康藏同胞同为中华民族之一分子,同负有复兴中华民族之使命,他日民族革命之过程中,康藏同胞之热血,必能结成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鲜果。”^①这些康藏青年主办的《康藏前锋》除了用汉文来推动“中华民族”概念之传播,也使用藏文来翻译与传播“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该刊物1936年就刊发了这样的两篇文章,第一篇题为*bod sog gi spun zla rnams kyis deng dus kyi rgya gzhung la ngo shes dgos pa dang rogs grogs byed dgos rgyu'i don skor* (《蒙藏同胞对中央应有的认识与努力》),文中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进行了解释:“mi ser gyi rigs brgyud kyi don ni/ rang re'i dkrung sgo'i rgyal khab nang gi mi rigs rgya manydzu sog po kha che bod pa bcas thams cad legs mthun gcig sgril gyi sgo nas rang gzhan khyad med par/ krung hA zhes pa'i mi rigs chen po bcos nas/ 'jig rten 'di na phyi gling gi rgyal khab rnams dang sa gnas mtho dman med par byed pa'i don no。”^②大意为:“民族主义之意如下,将我们中国国家的民族如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等团结一致,无你我之分,构成称为中华的大民族,与这个世界其他的国家没有地位优劣之分。”第二篇题为*bod sog slob sbyongs kyi bas mas bskyed skor* (《发展蒙藏教育之刍议》),对蒙藏教育的发展提出了建议,并说明了蒙藏教育落后之后果,“gal te bod sog spun zla rnams kyi mthu stobs dang rig shes yar rgyas su ma byed cing dpe la 'don pa'i skabs mang po srid gzhung gis ma ster na/ phyi rgyal batshan po rnams la rtsa nas hrad pa byed mi thub ma zad krung hA mi rigs chen po sgrub par 'dod dgos na smi lam byed pa'i lta bu yin no”。^③大意为:“若不提高藏蒙兄弟的能力和智识,且政府不为他们提供读书的诸多机会,将不仅无法同强势的外国们抗争,形成大中华民族也只能成为幻想。”《康藏前锋》与当时国民政府官办的藏汉合璧政治宣传性刊物形成了互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概念及相关话语在藏族社会中的进一步传播。

抗战前,由国民党高层主导的积极影响也促成了藏族人士总体上乐于接受五大民族共建中华民族的话语。蒋介石1930年底就在给九世班禅的函件当中,表述了当时国民党五族共建中华民族的观念:“此后中央本民族主义,将五大民族冶为一炉,合组成一中华民族,一心一德,以防止帝国主义者之侵略。”^④包括九世班禅在内的藏族人士在抗战前关于中华民族的表述基本上没有偏离五大民族共建中华民族这一基本立场,如九世班禅在1935年的一次演讲中解释了“中华民族”之组成部分,讲道:“吾人须知中华民族之基础,建筑于汉、回、蒙、藏、满,五大民族身上,所以要使中华民族达到独立自由之境域,必须五大民族共同努力,方可成功。”^⑤在

① 《康藏与中国》,《康藏前锋》1933年创刊号。

② *bod sog gi spun zla rnams kyis deng dus kyi rgya gzhung la ngo shes dgos pa dang rogs grogs byed dgos rgyu'i don skor*,《康藏前锋》1936年第3卷第6期。

③ *bod sog slob sbyongs kyi bas mas bskyed skor*,《康藏前锋》1936年第3卷第8—9期。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蒙藏委员会为抄送代拟复班禅函稿转呈核阅事致国民政府文官处函》,《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⑤ 班禅额尔德尼:《团结五族必须政教兼施》,《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1935年创刊号。

1936年于青海玉树举行“庆祝蒋委员长出险大会”时，九世班禅认为蒋介石脱险返京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征兆”，^①希望五族同胞在其领导下，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藏族人士对五族共建中华民族这一官方表述的欣然接纳与当时彝族、苗族等其他一些西南少数民族人士对国民党中华民族观的态度是有一些差异的。因五大民族中有藏族一席之地，藏族在话语上已被作为一个民族来对待，然而彝、苗等其他西南少数民族则不属于五大民族，所以这些少数民族在运用和表述“中华民族”话语时，并不是全部接纳五族共建中华民族这一叙事，而是强调包括西南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境内各个民族构成了“中华民族”。^②

虽然抗战前藏族人士总体上接受了五大民族共建中华民族的话语，但对于当时国民党构建一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具体实践，他们中一些人其实是不赞同的。从1935年开始，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明确将黄帝称为“中华民族始祖”，并规定每年派专员到陕西黄帝陵进行祭祀活动。^③对于国民党倡导的中华民族共祖论以及黄陵祭祖行为，自称“大中国民族主义学会”成员的藏族人士绛央尼马撰文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中国正面临外敌入侵的困境，采用黄陵祭祖来建立民族意识、恢复民族自信心，其用意是好的，但办法可能考虑不够周全，指出社会上目前还流行着将中国等同于汉的狭隘观念，中华民族共祖论以及黄陵祭祖行为恰恰是这种狭隘观念的体现，如果用国家来为黄陵祭祖背书，不仅不利于团结那些并不认可这一观念的少数民族，还坐实了对外人对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搞大汉族主义的指控。如此一来，黄陵祭祖就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借口，使后者利用民族问题来分裂中国。^④

二、抗战胜利前后中华民族建设问题再认识

在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围绕着中华民族建设问题发生了激烈交锋，目睹这些交锋的藏族人士应该是受到较大触动。1943年3月蒋介石系统阐释中华民族宗族论思想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后，中国共产党即组织了艾思奇、范文澜、胡乔木、齐燕铭等人撰写批判文章。其中，尤以陈伯达1943年7月在延安中国共产党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评〈中国之命运〉》一文影响最大，该文直指中华民族宗族论的要害，认为蒋介石对中华民族的了解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情况。指出蒋介石所提出的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以及“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等论调属于民族血统论，是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糟粕，是他们用来侵略世界的工具。^⑤中国共产党的批判持续了很长时间，毛泽东在1945年4月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仍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开幕词，说道：“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⑥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猛烈挞伐。在对国民党中华民族观的批判之外，中国共产党也在不断宣传自己的中华民族观。1943年7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与

① 刘家驹编译：《班禅大师全集》，班禅堪布会议厅，1943年，第167页。

② 伊利贵：《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精英中华民族认同的表述与实践》，《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③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第177页。

④ 绛央尼马：《关于民族扫墓》，《大公报》1935年4月8日。

⑤ 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解放日报》1943年7月21日。

⑥ 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5页。

中华民族——为中共二十二周年纪念而作》，在肯定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同时，再次主张“对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的原则之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①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通过在国统区办的报纸向国统区人民宣传自己的民族理论与政策。1945年7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以赞同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政策为口吻，宣传自己民族平等和自治主张。^②如此一来，中国共产党向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展示了一条有别于国民党的国家建设道路，对一些藏族人士产生了“较大的号召力”。^③一则，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为原则处理中华民族与国内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办法本身也是这些藏族人士积极在寻求的。再则，中国共产党以自治作为实践民族平等及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的具体举措，使得这些藏族人士找到了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突破口。格桑泽仁1945年10月出版的政论集《边人刍言》中以转载的形式将《新华日报》社论《我们完全同意中山先生的民族政策》纳入其中，表明了他对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政策的认同。鉴于当时国共关系之微妙，格桑泽仁又是国民党高官，他将这篇社论纳入自己的政论集，还是需要有一定政治勇气的。

在抗战胜利前后，一些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人士也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要求其放弃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建设理念。由于这些少数民族人士同时具有国民党党员身份，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外批评不同，主要是通过国民党内组织程序提出包容性的中华民族建设方案。在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格桑泽仁、冯云仙、黄清正、计晋美等藏族代表与其他内蒙古、新疆代表共同提出联名提案，要求保障国内各民族之应有权利：“请大会郑重决议，承认国内各民族之民族地位。无论参政中央，地方自治，除依照区域人口标准外，应兼顾民族地位，予中华民族各单位应得之权利。”在该提案后，格桑泽仁等蒙藏新疆代表们还补充了九条意见，这些意见包括：在认可中华民族一体性的同时，要求尊重中华民族的多元性；除蒙藏外的其他蒙藏回等各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障少数民族在中央的参政权；尊重各少数民族的宗教、风俗、习惯及语言文字；在边疆经济开发中，尊重各少数民族之权益与意见。^④从联名提案这一举动来看，格桑泽仁等藏族与内蒙古、新疆的少数民族人士已经就中华民族建设问题达成了一致看法，他们实际上是要否定蒋介石原先所倡导的中华民族宗族论，认为建设中华民族要朝着多元一体的方向努力。

面对来自党内外压力，蒋介石和国民党在中华民族建设问题上选择了妥协。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纲政策中，对民族主义的阐释重新回到了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所确立的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以及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两条原则，对境内各少数民族也不用“宗族”之类矮称，而是代之以“民族”或“边疆民族”，并肯定要扶持帮助边疆各族经济文化的平衡发展。^⑤继而，这些对民族主义的重新阐释进入了国民党六大宣言之中，成为之后施政的重要指导。^⑥1945年8月24日，蒋介石在解释民族主义的一场演讲中，不再使用中华民族宗族论，

①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为中共二十二周年纪念而作》，《解放日报》1943年7月1日。

② 《我们完全同意中山先生的民族政策》，《新华日报》1945年7月22日。

③ 王娟：《族群精英与近代中国的边疆秩序——以民国时期的康巴精英格桑泽仁为个案》，《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2期。

④ 格桑泽仁：《向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案〈根据主义政纲请明确承认国内各民族之民族地位，予以应得之权利案〉》，格桑泽仁：《边人刍言》，重庆西藏文化促进会刊发，1946年，第3—37页。

⑤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政纲政策》，《民意月刊》1945年第6期。

⑥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央党务公报》1945年第6期。

而是承认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民族地位以及民族平等原则。^①这些都表明国民党的民族话语出现了较大松动,国民党再次接纳了带有左翼进步色彩的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观。伴随着抗战胜利后宪法草案修正的启动,部分藏族还联合其他少数民族人士推动新宪法草案加入关于民族自治权利的条款。1946年初,藏族国民党中央委员格桑泽仁、黄正清及西藏文化促进会代表计晋美、格桑悦希联合内蒙古、新疆少数民族代表共17人向蒋介石上书,认为解决边疆问题,“惟有对于内蒙东藏新疆三方面所谓已设省区之蒙藏回三族人民撤销军权强制统治,及类似同化之传统政策,另行规定并保障边族之自治权利”。并要求在过渡期间,“请在五五宪草修正案内,以明确字句,具体保障国内少数民族之自治权利,俾符合三民主义精神。并请选派蒙藏回族各一人为宪法审议委员会委员,参加审议工作,以资代表边民意见”。^②蒋介石当时对少数民族代表的上书没有持肯定或否定之回应,而是回应称可将这些提议带到未来制宪的国民大会中讨论。^③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则对这些少数民族人士的诉求有了一个正面回应,大会通过的《对边疆问题报告之决议案》中,肯定了“我蒙藏回三族同胞俱为构成我大中华民族之一员,而其分布地方更为我领土不可分之一部”,并同意“在根据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组成统一民主国家之原则下,宪法中应有明白规定保障边疆民族之自治权利”。^④这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民族自治权利的一种肯定。

虽然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肯定了民族自治权利,不过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声音并未止息。^⑤最终,国民大会在1946年底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没有采纳民族自治一说,而是用了与内地类似的地方自治。至于保障各民族的民族地位方面,该宪法则有了一些实质性进步,在《总纲》中规定了“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同时在《边疆地区》一节中规定“国家对于边疆地区各民族之地位,应予以合法之保障,并于其地方自治事业,特别予以扶植”。^⑥至此,格桑泽仁等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人士所追求的中华民族建设方案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

伴随着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话语在形式上获得国民党内获得认可,藏族人士对中华民族建设问题的思考也达到了新的高度。被誉为中国第一位藏族女教授的邓珠娜姆在1947年初发表的《今后天下,今后中国,今后边疆》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国家建设的期待,其中涉及中华民族认同的主要有两条:“融铸‘五族一体’的民族感”和“体现‘中国一家’的文化圈”。邓珠娜姆认为,从历史来看,中国人的“文化感”相当敏锐,而“民族感”则较为淡漠,所以中国民族观念的内涵是文化意义上的,而非种族意义上的,“任何民族都可接受中国文化,任何民族都可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环,中华民族所以能久而弥壮,中国文化所以能久而弥新者,未始不由此……”。她提出,“在这建设时候已到临之时,我们尤应含英咀华,用精取宏,把回藏苗蒙汉保等诸族文化重新加以认识和估价,使中国之国不但政治上五族同体,而且文化上是‘中国一家’……”,为了达到“五族一体”和“中国一家”的目的,邓珠娜姆在文章中呼吁,要重视各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提高他们的受教育机会,缩小国内各民族间文化上存在的差异,使得各个民族有

① 蒋介石:《完成民族主义维护国际和平——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主持中央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讲》,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1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170页。

② 格桑泽仁等:《蒙藏回族中委及同乡会联名上蒋主席条呈全文》,格桑泽仁:《边人刍言》,第108页。

③ 蒋介石:《蒋主席复蒙藏回同乡团体代电》,格桑泽仁:《边人刍言》,第110—111页。

④ 《二中全会对边疆问题报告之决议案》,格桑泽仁:《边人刍言》,第103页。

⑤ 杨思机:《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关于内蒙古民族自治问题的争论探析》,《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2期。

⑥ 《中华民国宪法全文》,《新生路月刊》1947年第3—4期。

一个大体一致的知识文化水平。^① 邓珠娜姆的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即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靠什么来凝聚。在她看来,文化是最重要的凝聚剂,未来应通过教育缩小各民族之间文化上的差距,使得中华民族不仅在政治上是一体,在文化上也成为一家,这无疑是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一个具体路径。

三、结 语

民国时期是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重要阶段,为了推动转型的完成,国民党提出了一套国家建设的方案,即构建一国一族的民族国家。在这套方案中,建构统一的中华民族认同无疑是其中的核心。不过,国民党构建一元一体中华民族认同的尝试最终失败了。而通过本文对当时藏族人士认识和运用“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的检视,有助于我们理解国民党构建一元一体中华民族认同失败的原因。尽管国民党关于“中华民族”的主流叙事对于一些藏族人士形成“中华民族”认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这些藏族人士实际上并不认可国民党当初以构建一元一体中华民族认同为核心的国家建设目标,他们在话语使用上也不完全盲从国民党的主流观点,而是有一套自己的看法。这些藏族人士认为国民党的那套方案并没有顾及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感受,真正推行下去,将会损害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权益。相比于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中华民族建设方案则以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为原则,其民族理论与政策的指向不是构建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而是要达成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的平衡。中国共产党的这套方案考虑到了少数民族的利益与需求,也因此得到了格桑泽仁等藏族人士的认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国内少数民族人士的广泛支持,尽管这与国民党自身的腐败以及中国共产党主动的统战有关,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么一点: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赢得少数民族的支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国家建设方案在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同时,始终兼顾到了少数民族的地位和权利。

〔责任编辑 马俊毅〕

^① 邓珠娜姆:《今后天下,今后中国,今后边疆》,《西北通讯》1947年创刊号。

the imperial power to the local Fan areas, but they failed to maintain the common interests and values among the diverse governing power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authority had to cope with lots of Fan cases frequently. Since the Zhengde 正德 reign, the Fan people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 had endeavored to seek a new governance model that could promot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multiple powers in response to local turbulence with the entry of outside Mongol power. The mountainous governance system centered around Guolong Temple 郭隆寺 was established.

Keywords: chieftains; wei-suo 卫所 (guard system); Fan monks; Fan temples; Fan people.

Influential Tibetans and the “Chinese Nation” Concept and Discourse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Li Xuan (126)

Abstrac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the earliest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ncept and discourse among notable Tibetans likely originated with the Ninth Panchen Lama and his followers, who resided in inland at the time, and certain Kham Tibetans. These Kham Tibetans were bilingual in Chinese and Tibetan and traveled between Han and Tibetan regions. Impacted by Sun Yat-sen’s nationalist ideologies, these Tibetans began to grasp the “Chinese Nation” concept and embraced the discourse surrounding the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by five ethnic groups. They also initiated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ncept and discourse within Tibetan society by establishing various publications.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1937 – 1945) was pivotal in trigger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Tibetan compatriots with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identification prompted acceptance and affi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ncept that transcended geographical and factional boundaries. However, some Tibetans’ comprehens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ncept did not align completely with the assimilation advocacy of conservative Kuomintang factions. These Tibetans strove for a balance between unity and diversity within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ir discourse. Moreover, they recogniz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nclusive approach toward nation-building as more appealing. While preserving the entire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approach persistently considered the status and interests of ethnic minorities like Tibetans. This recognition somewhat explains the widespread support receiv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various ethnic minorities during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6 – 1949).

Keywords: the Tibetans; Kesang Tsering; the Chinese Nation; diversity in unity; Kuomintang.

Review of the Symposium on Deepening the Study on Foster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Work on Ethnic Affairs in the New Era (135)